

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

33

科学出版社

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译

科学出版社

1960

內 容 簡 介

这里选译的是近几年苏联“历史問題”杂志发表的討論俄国农民战争問題的一些文章。第一部分的两篇对比了德国和俄国这两个不同国家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图景,闡释了俄国农民战争的特点,描述了俄国历次农民运动发展的趋势,总结了农民战争对俄国封建社会經济制度所起的深远影响。第二部分收进了关于17世紀初俄国农民战争史的专题論文(最后一篇消息报导了关于这个专题的討論会的发言情况)。这些文章的作者表述了农民战争的含义,探討了俄国第一次农民战争的起訖年限、它的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和各社会阶层在这次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它的历史意义,以及有关的具体軍事活动,等等。

苏联史学家认为这些討論是及时的、有益的。农民战争問題也为我国学者所关心,现在将这些論文編譯成集,供有关史学工作者参考。

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

“历史研究”編輯部編譯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1960年4月第一版

书号:2129 字数:122,000

196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27

(京)0001—6,500

印张:5 15/27

定价:0.62元

目 录

論 17—18 世紀俄国农民运动的性質問題	
..... В. И. 列別吉夫 (1)	
論俄国农民战争的特点	В. В. 馬夫洛金等 (15)
* * *	
17 世紀初期俄国农民战争史的几个問題	А. А. 李朋 (34)
关于 17 世紀初俄国阶级斗争史的几个問題	
..... И. И. 斯米尔诺夫 (61)	
17 世紀初俄国农民战争史概論	В. И. 科列茨基 (86)
17 世紀初俄国农民战争的若干問題	Р. В. 奥夫欽尼科夫 (116)
关于 17 世紀初俄国阶级斗争的几个爭論問題	
..... 苏联“历史問題”編輯部 (140)	

論 17—18 世紀俄国农民运动的 性質問題

В. И. 列別吉夫

关于 17—18 世紀农民战争的性質問題，是俄国历史上的主要問題之一。这些战争是受压迫的农民为反对自己的奴役者而斗争的最高形式，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发生过极大的影响。

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对西欧，特别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深感兴趣。恩格斯的闡述 1525 年德国农民和城市下层反封建战争历史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在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之后迅速地写成，这决不是偶然的。恩格斯以 1525 年的人民运动为例，决然地着重指出德国人民許多世紀以来的革命传统，并作出了一系列有关 1848—1849 年革命教训的重要結論。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中关于經濟地位在农民意識里的特点的說明，对于研究反封建的农民战争的历史說来具有极大的意义。

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注視西欧各国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他們对俄国历史也有极大的兴趣。馬克思在了解俄国社会經濟状况时主要是注意俄国的农村。就馬克思的意图來說，“資本論”第三卷主要应以俄国土地关系的材料为基础。可惜的是，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馬克思在分析俄国农奴制历史时，閱讀了俄国学者們描写农奴为反对封建压迫而斗争的大量著作。馬克思很好地研究了 17—18 世紀俄国农奴化农民阶级斗争（如农民战争）历史中的这种基

本問題，是极其自然的。他特別仔細地研究了拉辛起义的历史，甚至为 Н. 科斯托馬洛夫的专题著作“司杰潘·拉辛暴动”（“Бунт Стеньки Разина”）一书写了詳細提綱。在提綱中他摒棄了科斯托馬洛夫的資產階級客觀主义观点，并且重新說明和挑選了一批他所說明的事實。這一提綱首次發表於1926年^①。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同俄國政治活動家們的大批通信中，有許多關於俄國農民戰爭的寶貴指示。

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把反封建的農民戰爭問題放在正確的科學基礎之上，闡明了農民戰爭的產生和失敗的真正原因以及它們的地位和意義。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們是把農民戰爭與社會形態的經濟發展的特點聯繫起來、與促使農民戰爭成熟的該國的經濟情況聯繫起來研究的。在封建生產方式下，生產力的狀況決定着生產關係的性質。封建主階級是主要的統治階級，因為它是這種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者。在生產體系中，封建主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促使他對生產工作者——農奴——實行着不完全的占有制。然而與封建所有制存在的同時，還存在有以個人勞動為基礎而占有生產工具和自己私有經濟的農民個體所有制。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封建生產方式在其最初階段是奠基在自然經濟之上的。農奴制領地同外界的接觸不大，可是，由於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社會勞動進一步的分工就使商品生產的比重增加了。封建經濟被捲入商品生產範圍中去。封建經濟對市場的依賴性使地主不得不從實物地租過渡到貨幣地租。這一過程就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瓦解。

在作為對抗性社會的封建社會里，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占少數的統治階級剝削着占多数的物質資料生產者。這就必然引起階級鬥爭。當生產力的發展開始越過與它們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範圍時，階級鬥爭就尖銳化起來。農民戰爭就是這種已趨尖銳化的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

恩格斯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德國農民戰爭首要原因，而這具

^① 參閱蘇聯“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雜誌，1926年第1期。

体地表现在城市工业和内外贸易的增长中。不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在那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場,也还存在着地方的割据状态。但是,商品货币关系愈来愈强烈地瓦解着封建农奴制,因而加强了封建主统治阶级和农民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自然经济的完全统治下,封建主剥削农民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限制的,但这些可能性在恩格斯所观察的那个时期中却显著地成长起来,从而引起封建压迫急剧地加强。恩格斯写道:“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附农民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貢賦。”^①

另一方面,随着侵入自然经济狭窄范围里去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依赖于封建主的农民就被捲入商品货币关系中来,对于加在他们身上的封建桎梏的感受也日益敏锐;而这就不能不促使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城市的各下层人民(城市平民)是最革命的阶级;恩格斯认为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最初的前驱者”^②。恩格斯详尽地論說到16世紀初叶德国社会的复杂阶级结构,如果不分析这种结构就不可能了解阶级斗争的許多方面。

馬克思指出,“土地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拉辛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极严厉地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和日益加强的封建压迫是发生在拉辛的起义之前。用馬克思的話說,“十七世紀的整个上半叶是斯杰潘·拉辛起义的准备时期。”^③

恩格斯在談到德国农民战争时指出,1525年的农民运动是发生在封建制度瓦解的时期,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刚刚誕生。虽然如此,但是恩格斯认为1525年的农民战争仍然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驱。恩格斯在說明1525年反封建的农民战争时曾考虑它的客观发展方向,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能很容易看破。恩格斯曾經写道:“封建制度的消灭,意味着资产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90頁。

② 同上,第404頁。

③ “青年近卫軍”杂志,1926年第1期,第107—109頁。

階級制度的建立。”^① 因此他認為 1525 年農民運動是進步的現象。

起義農民的行動首先是受他們的物質利益的支配。農民的鬥爭是為了能自由地占有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擺脫封建羈絆。農民運動因為以爭取早期基督教公社的社會理想——即“它要求農民和貴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貴族及特權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稅，特權，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財富差別”^②——作為掩飾，所以常常帶有宗教色彩。恩格斯着重指出，這種綱領以社會各被壓迫階層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因此促進了他們中間革命熱情的高漲，促使他們更加清楚地覺悟到自己階級團結的必要性。恩格斯同時也指出，實現這種綱領的一些嘗試必然遭到失敗。這個綱領的客觀內容“在實際上只能成為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預見”^③。

恩格斯認為 1525 年德國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是它的無組織性、自發性、農民運動的渙散性，是農民低下的覺悟水平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封建主的極端輕信，是農民富裕份子企圖與統治階級妥協的傾向。由封建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割據狀態，不能不影響到各地農民運動的性質。另一方面，擺脫封建羈絆的意圖是以各地農民捲入商品貨幣關係的程度為轉移的。雖然德國自 16 世紀初葉起就已具備了農民全民起義的前提條件，而在 1525 年爆發的農民戰爭也確已具有全民的性質，但是，這種割據狀態仍然使得“市民、農民、平民都如何不能採取集中的（重點是我加的。——列別吉夫）全民性的行動”^④。割據性還表現在起義者各個隊伍之間缺乏一致的行動，這也使得整個運動失敗。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恩格斯對德國使用的“農民戰爭”這一名詞，可否應用到 17—18 世紀俄國一些最大的農民運動身上呢？

①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俄文版第 14 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03 頁。

③ 同上，第 405 頁。

④ 同上，第 481 頁。

“农民战争”这一名称所指的是农民反对封建土地占有主的、广泛的国内战争。在这种规模广阔的农民战争中，才能够克服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和一些农民单独骚乱的局限性；全体农民才一致起来反对整个土地占有主阶级。

波洛特尼科夫的起义席卷了整个莫斯科附近的地区，并直抵莫斯科；拉辛的起义是在伏尔加河沿岸、斯洛博德乌克兰一带进行的，但拉辛的“诱人的檄文”一直传到了卡累利阿；1707—1708年的起义席卷了顿河、伏尔加河沿岸、斯洛博德乌克兰和国内的许多县；在乌拉尔一带和伏尔加河沿岸爆发了1773—1775年普加乔夫的起义。农民平日彼此的隔离状态在这些内战中被摧毁了。哥萨克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平民在克服这些分散性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工匠（рабочие люди）——未来的无产阶级——则在普加乔夫的起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把“农民战争”这一名词应用于封建农奴制俄国17—18世纪的巨大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上来。但显然可知，俄国的农民战争有其自己的特点。德国的割据性决定着农民发动的散漫性，这比俄国的情况更严重。在德国，农奴化的农民阶层要比俄国多得多，这一事实也给德国农民运动的性质打上了烙印。所以在德国，农民常同封建主妥协，而这在俄国则不能认为是典型的現象。起义农民的思想形式在德国和在俄国也不相同。对于德国说来，农民运动的强烈宗教色彩是它的特点，而俄国的特点是“皇权主义”。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同非俄罗斯各民族反对沙皇政府压迫的发动的复杂错综结合，则是俄国农民运动的特点。

俄国反封建农民战争发生的时期以徭役制度的统治为特征。农奴制的领地经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同外界很少联系”^①。封建制的领地在封建生产方式发展的最高阶段被卷入商品货币关系，这同时意味着它瓦解的开始。商品货币关系侵入封建制度的基本细胞，因而引起了农奴制压迫的加强和农奴化农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58页。

民階級鬥爭的尖銳化。

在封建制度發展的較晚階段上，出售的農產品——主要是谷物——的生產增加了。由於國內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些產品大量投入國外市場。

農奴逐漸捲入商品貨幣關係中去，這決定性地影響了俄國農村的社会經濟關係。隨着商品生產比重的增加，俄國農民爭取經濟獨立性的鬥爭日益加強，農村中的競爭也加強起來，生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等等^①。爭取經濟獨立的鬥爭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期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一鬥爭是隨着被剝削的勞動羣衆捲入商品生產的程度而發展的，由階級鬥爭的低級形式，如拒絕服役、農民和奴仆（холоп）的逃跑、偷竊和“搶劫”、甚至殺死封建主等，轉變為反封建的農民戰爭。人民運動是農民反對日益增強的農奴制壓迫的鬥爭的反映。農民發動的強度是隨農民受剝削的程度和他們捲入商品貨幣關係的程度為轉移的。

在封建制度下，主要的敵對階級是農奴和那些在當時“同時也是一些特別的等級”^②的特權土地占有者。只有在農奴制廢除以後，當農民階級分裂為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時，才發生農民內部的社會分化。由此列寧作出結論說：“在農奴制存在的時候，全體農民羣衆曾經同那些由沙皇政府保護、袒護和支持着的壓迫者——地主階級作過鬥爭。”^③

農民戰爭是農民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農民起義震撼了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基石，客觀上促使國家更迅速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軌道。儘管農民戰爭遭到了失敗，情況仍是这样。列寧寫道：“零散的、單獨的、小規模的剝削，把勞動者束縛於一個地點，使他們彼此隔絕，使他們無法理解自己的階級的一致性，使他們無法統一起來，無法了解壓迫的原因不在個人而在整個經濟體系。”^④

① 參看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載“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36頁。

②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93頁附注。

③ 同上，第383頁。

④ 同上，第1卷第277頁。

斯大林在同艾米尔·路德維希的談話中說明了被压迫农民的斗争是“自发暴动”、“自发起义”^①的表现。他指出农民思想的皇权主义性质是农民起义的思想实质,并指出农民起义的带有“强盗性”与无组织性尤其是拉辛起义的特点。农民的反封建运动虽然具有客观的革命的性質,但是还没有鲜明的政治觉悟。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說: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身上,“俄国第一次看到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②。

列宁与斯大林认为,农民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于那时起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般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③。

正确了解社会生活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才能够理解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之产生和失败的原因、它们的特点和后果等等。从上层建筑现象(如封建国家的武力、法律、教会)的活动中的去发现农民反封建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实际上,少数剥削者能统治多数被剥削者的原因在于少数剥削者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只是依靠上层建筑的帮助而巩固和延续着。

但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小看上层建筑在人民运动的产生和被镇压时所起的实际作用。许多研究封建制度时期阶级斗争的苏联历史学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內,当分析俄国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产生的原因时,不曾充分估计这一点:其所以促成各地人民起义转变为反封建的农民战争,是因为封建制国家有所削弱,这时它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不能执行其控制多数被剥削者这一主要职能。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两部著作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封建制度下超经济强制问题,关于在封建制度时期商品生产的地位问题,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性问题加以具体化并加以发展的理论,对于研究农民战争說来,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8页。

③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83—384页;“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9页,第13卷第100页。

在研究农民战争方面，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

(一) 很少联系、或甚至脱离开该社会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来研究封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种粗浅的方法论的错误就会引出把阶级斗争变为主要原因、变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之决定性的力量的错误结论。

(二) 封建国家乃是为封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但却脱离开基础来研究它。结果错误地认为超经济强制的加强就是反封建的农民战争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超经济强制的加强只是封建制度下各个时期产生人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而主要原因乃由于 18 世纪下半叶因生产力和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继续变化而引起的封建农奴制危机的发展和加深。

(三) 在许多著作中，其中包括作者本人研究这一问题的许多文章在内，对 17—18 世纪俄国各次起义的前提是用一般的事实来说明，而没有把它和这个时期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没有估计到在各次起义以前的时期中国内封建制度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

这些错误的根源是在于夸大了超经济强制的作用，和夸大了上层建筑的因素在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命运中的作用，并对于基础方面的现象估计不足。

一些历史学家不正确地评价了 17—18 世纪俄国农民战争的社会性质，并断言农民战争是“小资产阶级的战争”，但实际上，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农民战争才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这种混淆观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部分历史学家把商品生产当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始阶段，而这一阶段本身的发展一定导向资本主义。事实上，商品生产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导向资本主义，绝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混为一谈。

逐渐变成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们，是拉辛、普加乔夫和其他一些人起义的主要动力。无疑地，他们之参加起义，不仅是反对封建剥削和争取土地，并且也是为了小生产和流通能自由发展的道路（虽然他们主观上并未意识到这点）而斗争，这在商品生产和流通扩大

的情况下,归根結底是为了发展商品生产而斗争。

因此,拉辛、普加乔夫和其他一些人起义的客观意义就在于为小商品生产者摆脱封建桎梏以求得到自由发展的道路而斗争。馬克思写道:“自耕 (selbstwirtschaftend) 农民的自由所有权,对于小經營……显然是最通常的土地所有权形态。……在农业的发展上,它也是一个必要的通过点。”^①

談論农民战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历史学家們,忘記了商品生产只是創造农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一。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沒有另一个前提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劳动力变成商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才会出現。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在性质上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战争,它只是促进了商品生产与流通因素的增长,从而准备在我国以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形态来代替封建形态。

在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发生了俄国最大的农民运动。这时地主們保存着土地权,他們的經濟仍然带有封建性质。农民在其自发的发动中客观上进行着反对封建农奴制、爭取小生产者自由发展和小商品生产者发展的道路的斗争。

封建农奴制阻碍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俄国农民战争的特点乃是各地方部族同俄罗斯农民一道参加斗争。查波罗什的哥薩克們、乌克兰的农民們、伏尔加河沿岸和烏拉尔的各个部族都参加了17—18世紀的起义。另一方面,各地的民族封建主同俄罗斯封建主一齐来努力镇压运动。在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中,各种被剥夺了生产資料的平民分子(繙夫、无业游民等)也参加了反封建的运动。在雄伟的頓河、伏尔加河、德聶泊河上聚集了許多逃亡者和城市平民。平民和哥薩克的存在打破了农民起义的地方性,扩大了起义的地区。

在农民起义参加者的队伍中,有破产的城市小手工业者和低級僧侶的代表等等。反封建的农民运动的参加者,其成分也受到中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卷第1053頁。

世紀社会复杂性的影响。平民分子所积极参加的17世紀反封建的城市起义,如1650年普斯科夫的起义,是得到近郊农民的支持的。

几次最大的反封建运动的历史,駁斥了普列汉諾夫认为农民运动是反动的評价。列宁认为孟什維克关于农民运动之反动性的意見,是“荒謬的叛徒的”意見。

17—18世紀的历次反封建的农民战争是在封建制度各个阶段上产生的,所以按其形式、組織和动力来看都互有区别。

16世紀下半叶,俄国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出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增长及“全俄市場”的萌芽。这时的社会劳动分工迅速地加强了,它表现在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中。这一切創造了经济发展的新条件,又强烈地影响到封建世袭領地经济。17世紀的封建世袭領地经济力图用封建地租形式从农民身上取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力图改变封建貢賦的性质以便更有效地剝削农民劳动。随着封建主土地占有的扩大和农奴依附性的加强,仅存于俄国北方地区的国家农民,其土地縮減了,并且几乎完全丧失了。与此同时,領主耕地面积在其領地内部扩大起来了。这种情况証明了商品生产的增长以及国内市場的扩大,因为国内市场使“土地占有主对扩大耕地和增加谷物产品感到兴趣”^①。

这一切情况都引起农民們从中央各县大批逃亡到俄国南部边区,逃亡到东部地区和伏尔加河沿岸。这种现象加速了使农民彻底农奴化的措施(1581年的“禁年”法律[Закон о “заповедных годах”],1597年限令找寻逃亡农民应以五年为期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农奴制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同时,这些法律使农村中的阶级矛盾极端尖銳化,以致轉变为农民斗争的公开爆发、即波洛特尼科夫的起义。由于农奴主陣营内部矛盾尖銳化和波兰—立陶宛武装干涉的结果,削弱了国家上层建筑和农奴主的陣营,因而促进了起义的产生,扩大了它的規模和加强了它的实力。

在波洛特尼科夫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爆发于俄国南部边区,在那里已經聚集了大量逃亡的农民和奴仆(按 A. 巴里岑的記載,有

^① Б. Д. 格列科夫:“俄国农奴制历史的主要阶段”,莫斯科1940年版第77頁。

二万多人)。科馬利茨克乡的农民組成了运动初期的基本核心。并且,这里的国家行政机构比国内中心地区要弱得多。农民战争很快就席卷了整个莫斯科郊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和奴仆組成了起义者的基本羣众。平民羣众——伏尔加河的穷人在他們的领导者、伪王子彼得的领导下参加了起义。如果說伏尔加河沿岸的农民只想占領当地中心——尼日涅諾夫哥罗德,而不想进攻莫斯科;那末伏尔加河的穷人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方的局限性,并从伏尔加河出发到頓河,又通过北頓涅茨河向土拉进发。在И. 波洛特尼科夫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以其对封建主阶级及其国家机构的影响而加速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化过程,削弱了各个地方的封建閉塞性,从而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和流通的进一步发展。

在赶走波兰-立陶宛占領者之后,国内农业、手工业和工場手工业都发达起来了。17世紀时逐漸产生了把封建土地占有主捲入其范围之中的全俄市場。

1649年的国民會議法典(Соборное уложение)巩固了当时加强起来的农奴制,并且表明了地主农奴制的剝削越来越加强,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越发巩固。地产的繼承和把地产賞賜为世袭領地,在17世紀下半叶得到广泛的推广;封建主加强了边疆地区的移民方針,封建主土地占有制的范围普遍地增大了。封建主統治阶级政权的扩张,大大地把非俄罗斯各部族吸引到了他們的殖民活动范围中去。这些部族由于遭受到双重压迫,就变成了俄国农民反对沙皇和地主的斗争中的同盟者。

在我們所研究的这段时期中,工商平民(посадские люди)的地位也急剧地恶化了。这就是17世紀40—60年代产生許多巨大城市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拉辛起义前的二十年标志着劳动人民的地位由于一系列内部环境和外部政治制度的情况而进一步恶化了。1654—1667年波兰和俄国之間的长期战争以及1656—1661年俄国同瑞典的战争,都把重担加在劳动居民的肩上。大量地招募军队,規定了輸送徭役和各种特別的稅收。最后,为了偿付軍事开支而开始发行銅币,

这就是城市下层居民感到憤怒和1662年产生莫斯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镇压城市的起义并不能削弱被压迫人民羣众自发的抗議，例如这种抗議很快在拉辛及其阿达曼(атаман)——农民羣众利益的表达者——瓦西里·烏斯领导下的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中显示出来了。伏尔加河沿岸成了这次起义的中心。这里軍事和行政的管理要比其他劳役制流行的区域弱得多。許多外来的居民都聚集于此。

这一区域中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起义的产生和迅速扩大。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强了各地方的联系。在拉辛领导下的1670—1671年的农民战争，把俄罗斯农民和伏尔加河沿岸受剝削的人民羣众联合成一道強大的洪流。平民分子(即流浪人、繙夫、工人們)在起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們克服了农民运动的地方局限性。

镇压农民战争，并没有制止住受奴役者和日益增多的受压迫农民的騷动。从司杰潘·拉辛起义結束以来到1707—1708年新的阶级斗争爆发以前的数十年中，其特征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繼續发展。但是，在我們所研究的这段时期内，封建社会制度中新的經濟現象还没有达到使成长着的生产力和占統治地位的封建关系之間发生冲突的程度。随着全俄市場和对外貿易的扩大，越来越捲入商品貨幣关系中去的地主們繼續加强着对农奴的剝削。

1692年禁止拘留沒有“保条”(“поручный запис”)的“外来人和流浪人”。这一点在1695、1697、1699、1700和1702年又重申前令。这时极尖銳地提出了克服俄国落后性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执行落到彼得专制政体的肩上。彼得一世靠对农民的三重压迫，来促进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的巩固。貴族們为自己巩固了領地财产之后，就越发加强了对农奴的剝削。长期的、艰苦的北方战争的全部重担，都由劳动羣众来承担。

阶级斗争在这时期特別尖銳，它于1707—1708年轉变成頓河的羣众性反封建运动。在这次哥薩克农民起义中，农民队伍的領袖康德拉特·布拉文和尼基达·哥里起了显著的作用。在頓河发

生的运动繼續蔓延到頓河流域、伏尔加河沿岸、斯洛博德烏克蘭和許多中部县城。国家軍事力量被牽制在同外敌的斗争中，这一情况也促进了起义的扩大。

1707—1708年的运动，按其性質来说是复杂的。同农民—平民羣众一起参加运动的有暂时的“同路人”：下游的富裕哥薩克們，他們想保存頓河軍队的“自治权”并保証能够进一步剝削上游哥薩克和逃亡的农民。出身于哥薩克上层的布拉文采取不彻底的立場，而只是在农民羣众的压力下才执行他們的要求。起义主要的动力是与农奴制作斗争的俄罗斯和烏克蘭的农奴和奴仆以及平民分子（繙夫、工人）。这一运动同样遭到了失敗。

大約自18世紀下半叶起，俄国封建农奴制进入了瓦解时期。商品生产关系和流通的繼續增长，引起了地主耕地的扩大和农民份地的縮小以及劳役租和代役租的增加。农奴制扩张到烏克蘭和白俄罗斯地区，地主在得到国家农民和土地后就迅速加强起来。

封建农奴制經濟开始瓦解的重要特征，就是土地占有者企图把尽可能多的谷物抛到市場上去。这就推动他們去更多地剝削主要生产者——农奴。农民之过渡到“农奴月粮制”（“месячина”）是旧生产方式瓦解的鮮明标志。貨幣代役租开始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封建經濟制度之开始瓦解同样表现在农村的分化上，亦即农村中形成多数的“富人”（“богатии”）和“貧穷的”（“худые”）农民上，表现在与世袭領地手工工場同时并存的、以自由僱佣劳动为基础的商人手工工場，特别是农民手工工場的发展上。代役租农民组成了商人手工工場、特别是农民手工工場中僱佣劳动力的大量骨干。

总括起来，这全部事实不能不促使千百个单独的农民发生騷乱，和轉变成在普加乔夫领导下的1773—1775年反封建战争的工匠起义。这次农民战争的特点在于：土地問題在战争中被提得极明确，而战争的主要动机乃是农民爭取获得不在地主管轄下的土地。把普加乔夫的起义同拉辛的运动相比較，在前者的起义中我們已看見运动的分离性較小，因为全俄市場形成的过程不能不引起地方性因素的逐漸消灭。这一运动，按其性質来说已经是比以